

邹承鲁的科学 & 爱国心



1989年, 邹承鲁先生重访西南联大旧址

学者与科研专栏
DOI:10.16476/j.pibb.2022.0164

1946年5月, 即将北返的西南联大在昆明校址上树立了一座纪念碑。阳面是冯友兰教授撰写的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》碑文, 阴面是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》, 共刻有西南联大抗战时期先后从军的834名学子姓名, 其中就有近代中国生物化学奠基人之一的邹承鲁院士。

1944年, 侵华日军调集主力对中国大后方发动大规模进攻, 直逼贵阳、昆明和重庆。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, 一向崇尚科学救国的邹承鲁为了保家卫国, 不顾家人强烈反对, 积极响应西南联大号召, 毅然投笔从戎, 于1945年1月和联大200多名同学一起正式加入抗战队伍, 成为一名二等兵。2月5日, 他登上军用运输机, 飞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前往印度汀江。七八十年前飞越喜马拉雅山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, 不少运输机因为天气恶劣或其他原因葬身在这段著名的“驼峰航线”, 因此这条航线又被称为“生死航线”。邹承鲁和其他战士没有任何防护设备, 坐在冰冷的机舱地板上, 一旦遇到气流, 就被抛来抛去。二战时期的美军运输机舱内的恒温恒压功能极差, 飞机升高后舱内温度和压力都很低, 让人冻得打颤还透不过气来, 幸运的是, 他们最终总算到达了目的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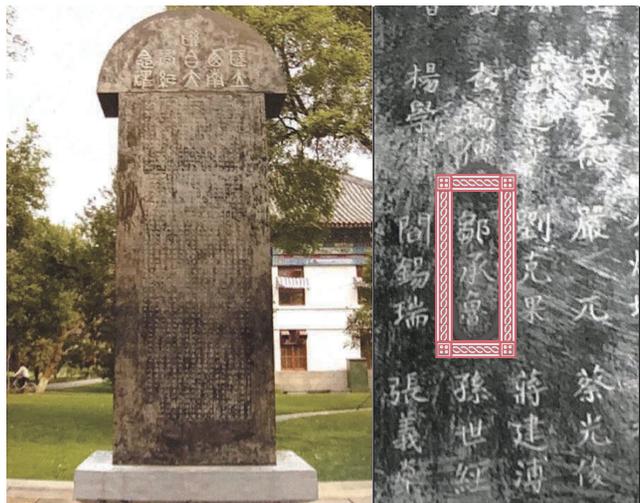
经过一个月的“中美汽车学校”培训, 邹承鲁开始了他的运输兵生涯, 每天开着十轮大卡车往返于兰姆伽和加尔各答港之间, 运送军物资。经历着战争的残酷和危险, 他只是一名汽车兵, 但是真真切切地在抗击日寇, 在保卫自己的祖国。青年军士兵们面临的危险不仅来自战火、悬崖, 还来自霍乱、“红虫病”、疟疾等传染病威胁, 甚至来自旧式军官对向往民主的青年学生军的迫害。有的学生士兵因染病身亡, 有的因所谓过激言论被捕甚至被谋杀。邹承鲁亲眼见到这一切, 更加坚定了今后科学救国的决心。

1945年7月, 日本战败已成定局, 远征军被召回国。邹承

鲁开着满载军用物资的一辆崭新的带拖斗吉普车, 沿着当时刚建成不久的史迪威公路启程回国。史迪威公路是连接中国大后方和缅甸、印度的唯一公路, 被誉为“抗战生命线”。但是这条狭窄的砂石路因为修得匆忙、用得频繁, 刚完工就已经坑洼不平, 是有名的险路。车队一路翻越崇山峻岭, 经常遇到塌方。由于山路狭窄, 每次错车时, 靠沟壑一边的车轮只能紧贴着路沿通过。如果不小心打开车门, 副驾驶上的人会直接落入万丈深渊。历经11天、1700多公里的长途驾驶, 邹承鲁终于回到昆明。

1945年8月15日, 日本投降。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, 邹承鲁完成了军人的使命。退役后, 他于1945年9月回到阔别八个月的西南联大继续完成学业, 顺利毕业。在邹承鲁心目中, 科学和爱国是不可分割的, 需要的时候要用鲜血和身躯保卫自己的国家, 科学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强大。

(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供稿)



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及碑阴的从军学生题名